■教育研究

预算内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

□沈百福　杜晓利

教育经济学认为，在公共教育经费既定的条件下，如何确定经费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间的比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各级教育的适龄人口，教育结构和教育规模、各级教育的成本情况等。

我国三级教育规模变化

1978年，我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普通高校的在校生人数比例是170.8:78:1；1994年，这个比例变为45.8:21.1:1；2006年变为6.2:5.9:1。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少，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增长，导致了这一结果。

197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85.6万人，1994年达到279.9万人，2006年达到1738.8万人。2006年，我国普通高校的在校生人数是1978的20.31倍，是1994年的6.21倍。但是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仍然只是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在校生数的零头。

1978年，我国中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是6675.4万人，1994年减为5894.1万人，2006年增长到10174.7万人。2006年，我国中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是1978的1.52倍，是1994年的1.73倍。中等教育在校生数增长率远远低于普通高校的增长率。

1978年，我国小学在校生人数是16424万人，1994年减为12822.6万人，2006年减少到10711.5万人。2006年，我国小学在校生人数是1978的0.73倍，是1994年的0.84倍。小学在校生数呈现负增长。

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比例

由于1978—1992年的经费分配数据难以搜集，本文将分析1993—2006年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三级教育中的分配比例。

预算内教育经费在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比例：1993年，我国普通高校的预算内教育经费是126.28亿元，2006年增长到1207.48亿元，增加了将近1100亿元。同期，普通高校规模也快速增长。但是，我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分配比例，1993—2006年,一直在18.98%到24.18%中上下浮动。1993—1996年，是下降阶段，最低点是1996年仅为18.98%；1996—2000年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分配比例，基本是持续上升，最高点是在2000年达到24.18%，2000—2006年则基本是持续下降，2006年仅为20.83%。

从这个变化历史看，笔者认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分配比例在2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可以较为稳定的，指望继续提高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分配比例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预算内教育经费在初等教育分配比例：1993年，我国用于普通小学的预算内教育经费为205.68亿元，到2006年达到了1854.12亿元，增加了1650亿元。1993—2006年，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对初等教育的分配比例在31.92%—33.63%这个很小的区间上下浮动。但是这个相对稳定的比例，是在这些年我国新生人口减少，小学学龄人口下降，导致了小学总体教育规模下降趋势，与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趋势相伴的过程。

预算内教育经费在中等教育分配比例：这里的中等教育是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和初中教育的合计。1993年，我国用于中等教育的预算内教育经费为251.14亿元，2006年增长到2024.59亿元，增加了将近1800亿元。同期，中等教育规模增长并不很快，没有达到100%。我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对中等教育的分配比例，1993—2006年，基本是个持续降低的过程。1993年，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对中等教育的分配比例为39.01%，最高的是1995年达到39.61%，然后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34.93%。

笔者以为，这个下降趋势是不合理的，因为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受到中等以上教育的学生也会更多，需要的预算内教育经费当然也更多，需要提高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对中等教育的分配比例。

国际比较表明，我国近些年来公共教育经费在各级教育的分配结构不够合理，中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偏低。2006年，我国将34.93%的公共教育经费分配给中等教育，低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3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处于中度人类发展指数国家水平，迫切需要加快普及中等教育，并提高其质量。但我国公共经费的分配比例却与这种要求不符合。

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异

1993年，普通高校、普通高中、普通初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分别为5309、666、332、168元；普通高中、普通初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与普通高校的比值分别是0.13，0.06和0.03，各级教育的生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差异极大。1993年以来，我国高中及以下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与普通高校的比值持续提高，到2006年普通高校、普通高中、普通初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分别为6395、2424、1963和1672元，普通高中、普通初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与普通高校的比值分别是0.38，0.31和0.26；分别比1993年提高了25、24和23个百分点。

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各级教育差异逐年缩小，财政预算内经费对各级教育生均分配合理性在逐年提高。

■干部培训／哈佛笔记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谈判

——领导艺术与谈判之一

□梁言顺

把谈判作为领导艺术乃至领导能力重要而又不可缺少的部分，对我们这批中国官员来说是相当生疏的，而进行关于谈判的教学培训却是现代哈佛培训课程中很重要的部分。随着培训课程的进展，8月的一天，主持人告诉我们：今明两天我们要进行谈判项目的教学，在教学中，可能会对你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进行挑战。主持人还介绍他的三位同事，首先是布鲁斯·帕顿先生，他是哈佛谈判项目副主任，也是两个创始人之一，他创建了一些咨询公司和其他组织。丹尼尔·夏培罗主持明天的讨论。他是哈佛谈判项目助理主任，在哈佛法学院授课，还在哈佛医学院讲授心理学。他根据自身经验编制的教材已在欧洲的25个国家使用。钱程先生是哈佛谈判项目的研究员，也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他以前在中国的监察部门工作，现在则致力于为哈佛法学院谈判项目制订中国方面的项目。接着开始了谈判课。

教授：请钱程先生用中文讲一下我们这个课的目的。

钱程（参与授课的教授）　为什么开这门课？谈判与我有什么关系？以前，我们对谈判有一个误区，似乎与日常的工作、学习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讲的谈判不是狭义的，而是一种沟通，努力达成一致，消除分歧，可以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几天所讲的谈判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如何实施你的影响力？如何发挥领导力？在谈判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底蕴，但在中国对谈判的系统研究比较少。我参加项目的初衷之一就是为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一些贡献。

教授：谈判的理念并没有在全球达到共识，在美国也是如此。世界上多数地方都没有把谈判作为一项课程进行系统的传授。过去的27年，哈佛谈判项目组就已系统地研究谈判问题，通过研究已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渗透在法学和商学的研究中。在很多活动中都需要谈判。有人认为，谈判达成协议就结束了，其实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谈判。每次谈判，不仅影响双方现有关系，还会影响到第三方。每次谈判的结果都会对以后的谈判带来影响，使今后的谈判更加容易，或者使谈判成为不必要。如果谈判是以开创如何解决问题的先河为出发点，从而使今后的谈判成为不必要，就可以制定一些规则。今明两天中，我们将以此为构架来交换想法。鉴于谈判是一种技能，请大家一道做练习。

教授：下面做一个手腕练习，每个人找一个搭档。游戏规则有四个：一是不许相互交谈，二是闭上眼，三是将对方的手压到桌面就得一分，四是时间为20秒。现在开始。

时间到，请告诉结果。

学员甲：0　0

学员乙：1　1

学员丙：2　0

学员丁：16　16

学员戊：26　26

教授：这个练习反映了人们对谈判的态度，比分少甚至比分为0　0，证明是把对方作为对手，期望通过压倒对方而获得胜利；比分拉大有可能是双方力量悬殊；但双方比分都高应该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练习是“手腕”练习而不是“掰手腕”练习，目标是计算每个人的手背触及桌面的次数，而没有说测算两个人的高低之别。毫无疑问，双方合作才是最佳选择，才能实现共赢。

下面，先介绍哈佛谈判项目的背景情况。此项目建立于1979年，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在全世界都能运用的关于谈判的理论和实践。根据观察，很多冲突的解决结果都不尽人意。今天随便拿出一份报纸，都可以看到这些不尽人意的结果。我们的研究曾用于1978年的埃及、以色列在戴维营举行的首脑会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与我打完网球后，让我们给他提一些建议，并看了我们刚出版的一本书。他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之后写信向我们致谢。1991年，经过努力，我们对南非各派进行训练，最终结束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同时我们对商界也产生了影响。

我们关于谈判的理念来自工作实践，而这些理念又在工作中得到不断的验证。很多公司对如何处理获得良好关系与达到理想结果之间的矛盾很关心，请在座的谈一下这方面的经历，要么是牺牲结果维护良好关系，要么是获得好的结果而损害良好关系，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没人举手）

如果搞好关系就意味着顺从我，同意我，这就是对关系做了狭隘的定义。这种定义如果用于国际关系非常危险。美国、苏联冷战期间，经历了阿富汗问题及星球大战，似乎良好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冷战期间，我们向美苏双方建议对良好关系给予界定，对任何问题不一定非得达到一致。我们既要良好的关系，也要实际的结果。在谈判中，不管你同意与否，双方都能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如何才能获得良好关系和实质性进展很重要，关键是良好关系并非要求所有观点达成一致，而是如何表达我们的立场。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如结了婚的人的关系有时很脆弱，每次对实质问题产生分歧时，都会发生问题。然而，虽有根本分歧，婚姻仍能维持。也就是说，一个强有力的关系，会迅速吸收分歧。战争与和平的差别并非取决于是否一致，实际取决于如何处理分歧。不管国际、国内，还是在工作部门中，冲突变得普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有发言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包容不同意见，而不至于发生战争。哈佛谈判项目最经典的一本书是《如何达成一致》，1981年出版，至今畅销。其观点是谈判不是讨价还价，谈判要使得双方利益最大化，尽可能满足双方不同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说谈判对领导来说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传统模式中，领导下指示，下属执行，现在不会出现了。领导必须说服人来做事，否则阳奉阴违，会拖延，提出反对意见，或公开反对。对领导人来说，要说服而不能强迫人们执行你的意思。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有一位教授曾经说过：总统最大的权力只是说服力而已。

钱程：我总结一下布鲁斯教授刚才说的主要内容。在实际生活中，常会遇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局面，一方面我不想破坏关系，另一方面我又想获得利益，而两者并不是只能取其一，我们有办法让二者兼得。谈判是处理冲突的过程，我们不在乎我们是否有分歧，而在乎如何处理这个分歧。

■文化视野／传媒文化

纸质媒体会消亡吗？

——关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出印刷版

□陈力丹　李冠礁

2008年10月28日，即将迎来“百岁寿诞”（11月25日）的美国主流大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将从明年4月起停出印刷版，每天改用电子邮件发送网络版报纸给读者，从而成为美国首家停止印刷，几乎完全采用互联网战略的美国报纸。

这条消息在我国媒体上引来一片关于报纸前途的悲观论调，原有的“报业消亡论”似乎找到了现实佐证，诸如《停止纸质日报出版：一个时代的结束》、《金融危机压垮美国百年老报》、《日报将成奢侈品》的标题见诸报刊和网络。

我们认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转型当然具有一定的事件性，但不必太看重，这是信息时代一种较为正常的现象。

传媒的外在形态不再是传媒间的本质差异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融媒”时代。各种传媒实际上正在或已经融合为数字化传媒，只是外在形态为了适应不同的接收需要而表现出差异，这种差异不再是本质的差异，而是形式的差异。以网络为例，作为一个集影视、声音、画面、文章、动画、平面等于一身的媒介平台，信息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博客、播克、掘客、BBS等等各种形式的传播沟通渠道。再如手机，六七年前，我们可以将它简单定义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通讯工具（移动电话），如今，拍照、收发短信、上网浏览新闻、定时获取手机报几乎成为每部手机的必备功能，只能说它是一个信息接收终端。

在新的媒体环境中，简单地从某家报纸改变发行、出版方式便推断出某种介质的信息载体已经过时，某个媒介时代已经结束，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未来，信息将通过移动终端传输，不管是互联网还是报纸，都将只是新时代信息传输方式的一种。传递信息，只要接收者和发送者都乐于接受，选择任何方式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各种媒介的外在形式，都会有不同的人群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讲，纸质媒体也不会消亡。

全球报纸发行量仍呈上升趋势

现在提出纸质媒体灭亡的论据，是根据欧美国家的一些报纸发行量下降。但同时另一些地区的发行量又上升了，据美联社援引世界报业协会2008年6月2日发表的报告中的统计数字显示，全球报纸发行量在2007年呈上升趋势，受亚洲和南美洲的需求推动，全球付费报纸发行量上升了2.6%，报纸依旧表现出了强劲的实力。

虽然数字化浪潮来势凶猛，但发展中国家的报业市场正在突飞猛进地持续增长，成熟报业市场面对数字化新媒体正在显示出显著的适应能力。世界报业协会总干事鲍丁说：“引人注目的是，印刷媒体继续成为大多数仍想保持信息灵通的人士的首选媒体。”世界报业协会主席凯文·奥雷利认为，报纸行将消亡的论调显然太过夸张了。“对报业持负面看法简直太容易了，许多评论者的论调也太过武断了”，奥雷利说，“人们总是不停地谈论各种电子接收设备和互联网，但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却总是被人们遗漏：热情，服务人民的热情，倾听人民的热情，急人所急的热情。只要有了这股热情，世界报业一定拥有美好的未来”。

雷奥利的“热情”说，或许有些武断，但他认为报纸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至少在看得见的未来，确实是这样。世界上很多地区并不赞同普及信息传播的数字化，即使未来报纸会减少，但作为一类人群的需求，不会消失。

纸质媒体和新媒体共存将是很长时期的现状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准备停止出版印刷版报纸，内部酝酿已经两年，并非完全由于当前的金融危机。当然，危机可能加快了这个计划的实施。美国的其他媒体巨头，如时代集团、甘尼特集团、《洛杉矶时报》等也在这时纷纷宣布裁员重组计划。但我们并不能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此次“变脸”以及其他媒体的裁员，视作纸质媒体消失的发端，以为所有的传统报刊都将步其后尘。

美国加西亚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马里奥·加西亚曾经说：“人们总是长篇累牍地谈论一种媒体的出现将取代之前的媒体：先是书籍取代布道，然后是报纸取代书籍，广播取代报纸，而电视则将消灭其他所有媒体。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一个重要的因素：时间。在24小时内，一个常人能做几件事情。这才是对我们的挑战。”

现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总编辑约翰·伊玛也认为，纸质媒体不会最终消亡，他称：“现在的媒体，特别是报纸正在经历一个转型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个报社或者杂志社，它的各种形式的出版物都会同时存在。”

我们不能轻易断言新媒体将取代纸质媒体，相反，新媒体与纸质媒体相互依存倒是现实，当前，80%的纸质媒体都有自己的网络版支持，它们看到了网络媒体的优势。新媒体提供了多种信息传播的新式渠道或平台，纸质媒体因新媒体的存在而扩大了传播渠道。比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虽然近年来发行量下降，但是如果加上网络版的订阅量，它的读者总数是增加的。当下一些报纸推出手机报、电子报，充分发挥“报网互动”优势，虽然目前看来收入有限，但却有效地增强了报纸的品牌影响力，无形之中也扩大了报纸的销路。

历史上只有诸如纸草、泥版、羊皮纸那样的原始信息载体会消亡。纸，是经过二千年历史考验而得到确认的方便的、可触摸和留存的信息载体。从现代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没有哪一种大众传媒，因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出现走向消亡。新媒介是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出来。当新的传媒形式出现后，传统的媒介形式往往不会死亡，而是会继续演进和适应新的情况。每一种新兴媒体的出现，都程度不同地丰富了人类社会的传媒形式，各媒体间能够共存共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出印刷版不会对中国报业产生直接影响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告别“每日投送纸质报纸”，这一变化在美国也仅是个别案例。中国报业的发展水平和美国相比又差了一个级别，并且中美两国的传媒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论从平等使用新闻资源、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来看，还是从科学核查广告收益和报纸发行量来看，两国完全不处于同一个层次。中国的报纸市场形成不久，中国所有报业集团的年盈利额，不过区区几个亿人民币。而在美国，单纽约时报公司这个中等传媒集团的年盈利额就是29亿美元。

再看网络，虽然在中国越发普遍，但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大多数中国人尚没有接触网络的渠道。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为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然而，互联网普及率却只有19.1%，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1.1%)。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的大部分人群仍然是依靠传统媒体来获取与之相关的资讯，报纸在我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我们与其杞人忧天，不如抓住当前中国报业发展的机遇，抓住新媒体为报业创造的新的发展空间，从丰富报纸的内容与提升服务质量入手，直面新媒体的挑战。

高品味的文化娱乐，透明的新闻，独立观点的新闻评论，全方位的信息服务，效率高的发行体系，这些东西都应该是一家组织结构完善的报纸提供给公众的。然而，目前很多报纸并没有做到这些，我国的报业如果不建构优质的服务体系，不去规范广告和发行，而是热衷于去搞恶性竞争，报业的危机可能很快到来，这不是新媒体出现的自然结果，而是报业放弃与新媒体竞争（合作）的结果。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印刷版即将停刊，而同时，可能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诞生几家新的报纸，消失了，诞生了，这很正常。我们应该冷静、理性地对待。媒介融合是当今传媒发展的趋势，纸质媒体和新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对中国报业而言，更没有必要纠缠在报纸是否消失的话题上。至少在中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踏踏实实地提高内容质量和服务水平，报纸仍旧可以打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资料

传媒自身也是一种社会环境无形中改变着社会的结构

大约10万年前出现语言。语言是人类的第一种传播媒介，正是语言繁衍出人类的认识能力，并构成现在一切传播的基础。但是这种以人的生理听觉为基础的传播只能建立在人们相互距离很小的范围内，这就决定了单纯的口语社会注定是封闭的家族部落社会，拥有高超记忆的祭司成为比部落酋长还重要的几乎惟一的特权人物。

大约5000年前出现的文字，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打破了原有口语社会的秩序。文字的书写延伸了信息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智力发展。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影响到关于知识的社会定义，读写能力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中最重大的知识垄断，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掌握这种技艺并成为统治者。

印刷术的发明在传媒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中古时代极少数人对信息传播的垄断，第一次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

从19世纪的电报、电话、电影到20世纪的广播、电视、卫星通讯、计算机网络，电子传媒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无形中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电报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

电话无形中打破了个体间适当距离的规则，它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只有在朋友和情侣间才被允许的耳边呢喃的距离，手机电话则完全实现了“只要有电话就有家”的理想状态。

电视将不同类型的人群带到了相同的场景，于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电视面前变得模糊了，而网络传播则进一步提供了隐去身份参与交流的条件。

电子传媒无形中创造着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这方面的认识正在成长中，例如在许多情况下，传媒报道一种态度的转变可以取代必须的行动，公开的民意调查部分替代了大街上的示威游行，因为电子传播的力量有时已经超过了具体行为显示的力量。当人们通过电子传媒教会各社会团体相互了解时，也就改变了社会团体间的界限及群体的周边范围。当电子传媒使“距离”的意义消失时，人与人接近在道德上便是一种好的选择。

（摘自《传媒形态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新闻记者］2003年第11期）